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57 期

57

- 吴思：危机驱动——中国政改预测的一种框架
- “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研讨会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四年十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胡旭照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两次学术研讨活动的记录，分别为第 95 期发展沙龙吴思先生关于“危机驱动——中国政改预测的一种框架”的演讲，以及关于“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的内部圆桌会议。

《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吴思先生提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测框架，类似玛雅金字塔的形状。第一层是最高层，即政治局的改革意愿。第二层是驱动最高层是否改革的危机，按照强度危机被分为五级。第三层是发动或平息危机的社会行动者，分为官士农工商。最后一层是影响社会行动者的重要因素，有六种因素：经济形势、财政收入、管家权力、观念变化、组织成本、政府王牌。吴思也据此作出一些的综合性推测，包括：未来五到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 7% 左右，那么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如果出现，按照惯例，政府将及时让步，主导并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很低。在中小级别的危机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或者中型的改良。这些改良发生最大的可能是在比较容易控制的领域，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独立。

基金会为讨论新近成立的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

(CRA)，举办了一个内部的小型圆桌会议。专家们就国际国内关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金砖银行将怎样改变金砖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如何？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与人民币国际化会发生哪些相互作用？总部选址上海将如何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应在哪些方面加快建设？专家们阐述了各自的深刻见解。乔依德先生指出中国可在应急储备安排中起主导作用。徐明棋先生认为，增强话语权并不是要抛弃现有的国际规范，金砖银行是历史性突破但不是另行一套。刘海影先生提出应更多依靠央行的互换来解决贷款风险问题，而非由储备资金来承担。王世豪先生认为关键是要把金砖银行的章程写好。郭爱军先生指出金砖银行是对美国否决权的否决。任新建阐述了金砖银行将如何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详细内容请见本期通讯。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四年十月八日

目 录

吴 思 危机驱动——中国政改预测的一种框架.....	1
提问与讨论.....	19
“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研讨会.....	26
提问与讨论.....	34

危机驱动——中国政改预测的一种框架

吴 思

《炎黄春秋》杂志常务社长、总编辑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4 年 8 月 5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各位来宾，请安静一下，我们的演讲正式开始了。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地请到了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先生，为我们做沙龙主题演讲。吴思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在多家报纸担任过记者或编辑。他从 2009 年开始，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的法人代表，现在是杂志社的副社长和总编辑。大家都知道，吴思先生写了很出名的一本书，就是《潜规则》。他今天演讲的节目是“危机驱动——中国政改预测的一个框架”。今天我们来的人也很多，几乎坐不下。我想这是冲着两点，一是吴思先生的盛名，二是这个题目大家也很感兴趣。下面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吴思先生。

吴思：感谢大家光临。我这个讲座，这个话题，是 2013 年 3 月份，就是十八大刚结束不久，大家都在关心未来会怎么走，那时候三中全会决定还没有出来，反腐也没有这么大力度，我把各种信息综合起来，做的一个猜测。我给他们做了一个讲座，想搭这么一个预测框架，主要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个框架象玛雅金字塔的形状，分几个主题。第一层，我画的是最高领导层，他们的意愿，他们愿意不愿意搞政治体制改革。第二层，画的是驱动最高层改还是不改的危

机，我把危机按照强度分为五级。第三层，就是发动危机或平息危机的社会上的行动者，有官，有民，民又可以分士农工商，这是社会行动的主体。再往下一层，就是最后一层，是影响这些社会行动者的重要因素，我列了六种因素，比如经济的上行下行、财政状况、权力、人的观念、各种社会行动的组织成本（包括互联网）、政府的王牌。我就建了这么一个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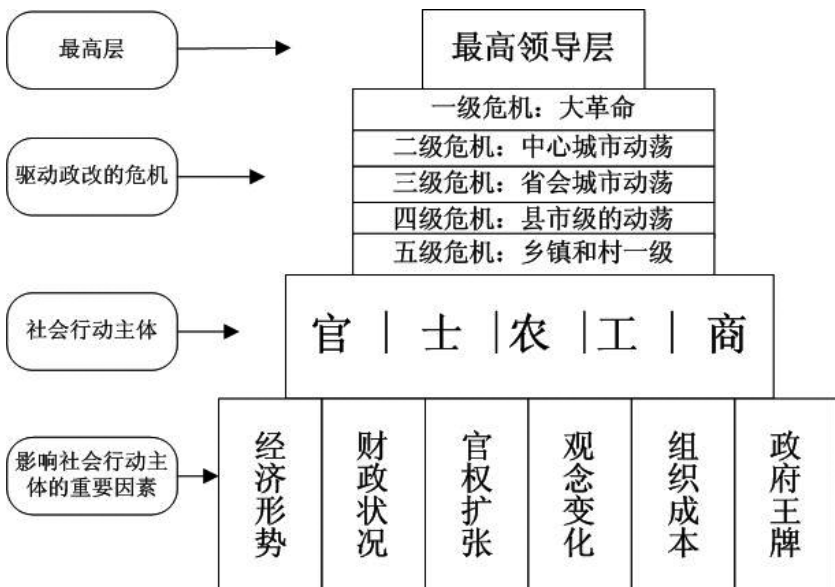


图 1：政改预测框架

我就想用这个框架，把我们经常见到的社会现象组织起来，寻找它们的关系。用这个关系，对未来中国 10 年到 20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更宽泛一点说，就是改革，做一个预测。这就是我去年年初做的一次尝试。现在一年半过

去了，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我现在还是依据当时的想法讲。因为大体上，好象还不离谱。有些变化呢，我就一边介绍，一边随时做评论。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话题，题目是“危机驱动——政改预测框架”。

我先说第一个，最高层有没有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今晚给我的时间，说是一个小时，我有一次讲这个话题讲了一天。我怕我讲得离谱，所以我看着点稿，经常把我拉回来，不要让我扯远了。最高层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去年预测，主要靠危机驱动，更宽泛的说，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压力。

第二层就是危机，我把在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发生的危机分作五级。或者把中国历史整个背景拉进来，最高一层的危机，一级危机，就是象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这种推翻政府的大革命。危机可以有不同的分类角度，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政治诉求、经济诉求、采取暴力或非暴力、合法或非法等不同的角度对危机分类，我的分类就是强调它的强度，它的力量。所以第一级，我的分类就是大革命。二级危机，中心城市动荡，蔓延全国。三级危机，是省会动荡，蔓延全省。比如说，四川保路运动，我们知道四川保路运动后来上升为一级危机，引发了辛亥革命。处理不当，危机可能升级；处理得好危机可能降级。还有像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拉萨事件，也是三级危机。四级危机是县市这一级的动荡，比如说象厦门散步、什邡事件，瓮安事件。厦门散步、什邡事件是由环境引起的，可以讨论，不行我就让步，是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可是瓮安事件简直就是一个泄愤的事件，一个人莫名其妙地死了，大家全都跟着起哄，

过去把县政府烧了。这样的事情是像恶梦一般的事件，难以预测，不知道在哪里发生，但是力度非常强大。第五级危机，就是乡镇、村以下的事件，这是我的五级危机的分类。

我们来看，五级危机全国每年几十万起，从几万起到十几万起，后来到 20 多万起，后来就没看到统计数字了，数不胜数。四级危机，县市这一级，大概每年一到两次。三级危机，象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这样的，大概 10 年左右在中国有一次。二级危机是一代人以前的事了，在 25 年前。一级危机是 1949 年的事。这就是发生的频率。

危机一旦发生，我们就看到一些互动的常规。通常无论什么原因触发了危机，官方立刻作出的反应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努力平息危机，这是官方在面对危机时的常规动作。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立刻就关注危机的政治体制的含义，努力阐释、提升它的制度含义，而且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影响，动员社会各界的参与。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动员成本，如果官方不慎，五级危机可能上升为四级。

我们再看民间经常引发危机的原因。比如说征地，还有因环境引起的危机量非常大，还有泄愤事件。象乌坎危机这种事，就是五级危机处理不当，迅速升级为四级，到县里去游行，县里把人拘了，结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处理好。一旦这个事处理不好，省政府马上出面，直接派一个工作组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一旦发生危机，我们马上可以看到的双方的动作。官方的动作就是在五级危机之前，严防死守，建立一个庞大的维稳体系，但是一旦危机出现，到五级或者四级以上，官方迅速让步，降低这个事情的政治和其它的震动力度，用人民币解决问题，处理成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危机的分类和危机一旦出现之后的

互动情况。

在这个互动中，我们能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小危机小让步；中危机中让步；如果是大量的中小危机聚集起来，有可能推出比较大的让步，比如说取消农业税。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有了小危机，就有小改革；有了中危机，就有中改革；积累了大量的中小危机，就可能有比较大的改革。由此推论，如果出现比较大的危机，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就很可能启动政治体制方面的大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发生的前提，就是不要出现三级以上的危机。如果危机就是压在四级五级，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必然发生的条件。这是关于危机的层面。

下面我就分析第三层，就是主要的社会行动者。如果我们把这个社会看作一盘棋，大概可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官，一个是民。民又可分作士农工商，如果再细分，知识分子还可以再分，农民也可以再分，工人也可以再分，比如农民工和城市工，商也可以分为国企老板和民企老板。我下面细致点讲。

我们先说官。一个重大的社会集团，或者叫阶级阶层，如果他们的权利（right）是扩张的，他们就受益者；如果维持不动，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权利边界受到压缩，就是受损者。我们通过权利边界的扩张、维持和收缩，判断他们的政治态度。当然还有一种影响政治态度的，就是名义权利很大，比如人大、最高执法机关，最高的立法机关，但是实际权利不大，有一个落差，经常被人家嘲笑为橡皮图章。实际权利和名义权利的落差，也会造成不满。总体说，中国的官方集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集团，人才济济，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手里掌握着一年十几万亿的财

政收入，还拥有金融、能源、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世界级垄断公司，垄断了教育、传媒和医疗行业、控制着全国土地和矿产资源，还拥有强大的暴力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集团。

官方在十八大之后，对于民间或者对于世界开出的承诺，是五位一体的建设，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有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小康社会，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和民生，这两个也属于官和民的共同利益。官方希望平稳发展，十年之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是官方开出来的承诺，你们支持我，我们给你一个世界第一，我们在这五个方面大力发展。具体发展的措施，主要就是深化各种改革，其中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官方整体的力量和它的承诺。作为一个整体，官方的实际权利，大于名义权利，所以官方集团是一个受益集团，这种优势地位导致权利边界继续扩张，并且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对这个集团来说，在其他条件未改变之前，维持现状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但是官方内部，也有不满，有这么几个不满：一个像人大、法院、检察院这些条条，他们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名义上他们可以独立司法，实际上经常为他人背黑锅，名义上他们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实际上经常被人嘲笑是橡皮图章。如果他们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合法的利益得到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会发生，这是条条。块块，各地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称，权利义务不平衡，这种不平就是不满的温床。

还有对于地方普通公务员来说，晋升的道路往往被各县市权势家庭、权势家族垄断。在上海，在各省城，在中

中央政府这个层面，可能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一旦进入各地，好不容易考上的、精英中选拔出来的那些公务员，他们是干活的，可是升迁没有他们的份，这就意味着官场当中培养了大批的宋江，宋江是能量巨大的一批人，一旦有机会，就有可能闹出大事。官家集团虽然总体上是既得利益集团，但是内部也隐含着许多危机。

然后分析民间的这些力量。先说好的，“农”，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中国农民目前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在 2000 年后，到农村调查，那时候名义上各种税费加起来，不能超过 5%，这是中央规定的。实际上我们一户一户访问，经常的感觉就是，实际农民的税费在 20% 到 25% 之间。我跟着一个村民小组长在田埂走，他带我去家访，我听他在骂政府，我说听你这个口气，是要造反啊。他说，打不过他们，打得过早反了。这就是 2004 年取消农业税之前的状态。2004 年之后，2005 年我去做过一次调查，2009 年又一次。2009 年的那个调查，感觉非常强烈，就是农民高度满足，种地不仅不交皇粮了，还给补贴。淮北那一带，像安徽淮河流域，种一亩地给 50 块钱补贴，有的地方富一点给 70 块钱补贴，这是明补，还有暗补。就是按粮食价格卖给你种子，每斤种子都有一两块钱的补贴。有明补有暗补，还有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有正在建立新的社保全覆盖，正在覆盖到一些老人。这对农民来说，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按照公共契约的说法，农民在和政府的公共产品交易之中，农民赚了，他没有付出什么东西。当然，他得付消费税，但是最主要的生产那方面都不纳税，所以农民高度满意。2009 年我的感觉是，如果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有人上井冈山，农民给你通风报信，给你运粮，给

你站岗放哨；2009年有人再上井冈山，农民就是把他们绑缚官府，这是巨大的差别。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农民满意，中国就没有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土壤，所以一级危机，像中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这类革命，在中国没有发生的条件。

农民之中不满的，是被征地的，城郊的农民。这些农民，首先比例小。我们知道，18亿亩耕地，有人说是22亿亩，我们就假定是20亿亩耕地，有1亿亩耕地被征，也不过是涉及5%的人口。而且不是一年，是十几年的过程，所以在每一年涉及的农民人口比例都是很小的，而且是分散的。而且现在的征地政策，是补偿30年的土地产出。2009年，取消农业税之后，淮河流域一亩地粮食的净收入大概500块钱，十年50000，30年15000，这就是这个土地的价值。实际上，真的给钱大概3万到5万，3万5万块钱，征你一亩地，对农民来说，亏了还是赚了？如果你只能种地，你得了三万，现在一般总得4、5万吧，5万块钱存银行一年也得两千多块钱，比你一年种地500块钱好多了。所以农民被征地的绝对值是赚了，只是相对亏损，因为政府征了地，转身把3-5万的地卖30-50万。农民看着如此巨大的利差，才闹事，才不满。但这都是分散的，可以谈判的。所以农村征地问题不断闹起来，可能引起一些政策变化，但不是革命的土壤。

第二个，“工”。工又可以分为农民工、城市工；农民工又可以分为第一代，第二代。我在农村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对政府高度满意。我们问挑拨性的问题，你有没有受过不平等的歧视？在城市里有没有过，在打工地有没有过？问他们挑拨性的问题，他们都说没有，很公平，很公道。你

到张家港来，你的工资（那是 2005 年前后）你才挣七八百块钱，是人家当地城里人的一半，人家干同样的活挣 1500，公平吗？第一代农民工说公平，我们到人家那里去，又不是人家请我们来的，人家让我们来挣钱；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这样。所以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感谢党允许他们自由到外面打工，他们觉得是自己选择的，很满意。

但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生下来，就处在这种政策环境之中，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了差别，他们不满。但是第二代农民工，虽然比起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多不安定、不满意，但他们工资年年上涨。目前 2.6 亿农民工当中，有 60% 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回乡种地回不去了，进城又买不起房住不下去。他们对未来模糊，提不出自己清晰的政治主张，过一天是一天。但工资年年上涨，又抱着一个乐观的期待心情。如果经济不出大问题，没有大规模的失业，这个群体也是基本稳定的。如果大规模失业出现，这就是遍地干柴烈火，不一定会出什么事。如果深入追究，农民为什么买不起房？如果把房价分解，我们发现大部分的房价的钱进了政府的腰包，深入追究下去，农民工和政府之间可能潜伏着重大矛盾。但是如果有人在危机关头，在农民已经到处骚动起来的时候，把这个事点破闹开，这就只是一个隐藏的危机而已。这是农民工。

这个“工”里，还有城市工。城市工在 1990 年代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朱镕基抓大放小，又用国有企业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到胡温时代，社保体系建立，城市群体事件马上开始下降。所以城镇的工人，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团体，不是一个危机的发源。而且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都进入第三产业了，真的干活的基本都是农民工。

工农说完了，再说“商”。先说民营企业，再说国有企业。2012年，民营企业统计是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民企对于就业率的贡献超过80%，在GDP、税收和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都超过60%。此外，中国还有3900多万个个体户。所以民企在中国就是大半壁江山，他们是主要的经济领导者和推动者。如果用过去阶级分析的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发财了。但是又普遍不满，这个不满，一个是被垄断性的国企排挤，税费越来越重，机会越来越少，还经常遭遇敲勒索，官员的吃相越来越难看。面对官员和垄断性的国企，民营企业家感觉到名义的权利和实际权利不相符，实际权利小，他们的政治权利与社会贡献不相称，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政治性的组织活动。他们有被剥夺感，面对这些不安不满和剥夺感，他们不敢有任何组织上的整体的行动。他们的方式是通过个人家庭的移民，用脚投票，来追求安全，代替反抗。但是如果抗争风险下降，象二级危机三级危机出现的时候，他们这些不满，可能就会有含金量很高的一些表达方式。这是民企。国企如果是靠垄断吃饭的话，跟最高层，或者跟官家集团一部分，就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他们也是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没有强烈的改革愿望，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大体来说，属于既得利益集团。

最后就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分很多种，我们先把知识分子分为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中，传媒类的知识分子，干我这个行业的，被剥夺感可能是最强烈的。他们安身立命，获得自己的社会荣誉、还有那份物质报酬的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可是这方面我们知道，打折打

得厉害，管制非常厉害。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的落差最大，名义上有的自由，实际上可能连 10% 都没有。而这个权利又恰恰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这种切身利益，这种被剥夺的切身感觉，就支持着媒体全行业的自由化倾向。另外就是律师和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比较多的被剥夺感。可能法律界的感觉更突出，他们比较了解外部的世界，对民主对法制有更多的认可，所以在各个社会集团之中，知识分子集团大概就是不满最多的群体。所以一旦出现各种群体事件，无论是五级危机、四级危机，知识分子通常都借机宣扬自己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把自己的不满变成全社会的不满。所以他们在官方眼里看来，就是麻烦制造者。每次出事，都看到他们在那里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尽力放大危机的意义，煽风点火。这种危机，在我看来，就是很难解决，因为它的根基根深蒂固，没有办法。官方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可能就这么持续下去。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凭借权力和财力，通过课题费、职称、个人升迁等种种手段，将大量的知识分子拉入门下，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引起知识分子之中的左派与右派间的分裂。应该说，官方在目前的条件下，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这是知识分子。

再说大学生。中国的大学生，有闹事的传统，但是 1989 年之后，在严密的控制和市场就业引导之下，大学校园基本平静。2012 年，在校大学生的总数是 2536 万，每年要有六七百万的大学生毕业，虽然就业机会不平等，要拼爹，拼关系，但是目前就业率还没有低到酿成危机的程度。如果经济下行，经济状况不佳，就业困难，那时候平等机会被剥夺，拼爹拼关系，这种不满就可能强化，那时候校园很难保持平静。现在看起来，没有到那个份上。

我再概括一下这些行动者。上述这些行动者，对政府有一些共同满意的领域：就是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中国地位提高。从公共契约的角度看，官方提供了基本合格的公共产品，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明显加强，表现大体合格。从公共契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民间这些群体对政府大体满意的道理。但是，他们也有共同的不满，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获得上述公共产品的代价方面，这些代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环境污染严重不满，这是很多四级危机的起因。第二，对贪污腐败两级分化不满，这是象瓮安事件，泄愤，仇富，见着官方，有人一喊，你不就是一个官吗？就会群起而攻之，就是这种事情的原因。所以现在习在努力反腐，就可以降低这种风险。尤其是不可控的民愤的风险。第三，就是对于空话假话道德沦丧的不满。第四，普遍存在的不满，无论是官是民，但感觉自身权利不能得到可靠保障。所以象王立军这样的人，还要投美领馆。大量的老板移民，一浪又一浪，方兴未艾。无论是官是民，普遍感觉到缺乏安全和尊严，上访者就更不用说了。上述这些不满，都可以追到政府头上，进而追到政治体制，所以任何群体的特殊不满，一旦引爆，在知识分子的解释、扩张和动员之下，都可能获得上述共同不满的呼应、策应，指向制度缺陷，指向政府，引发对立，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整体共同的满意和不满意之处。

所以我们看到，针对这些不满，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理解本届政府的几个动作。比如反腐，就能拆除一个引爆重大不满的引信。比如，传说中四中全会正在准备的法制改革、司法独立，这就可以增强各方面的安全感。如果这些事情都成功了，这些危机就可能往后拖，可能延后。你说危机的彻

底消除，刚才说了，根子上的消除恐怕不行，但是再拖五年十年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如果失败了，这个反腐在内部搞砸了，可能马上就会出问题。如果内部出大危机了，可能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会启动。对于社会上的主要行动者，根据对其共同的满意和不满意的分析，可以推出两项总体判断。第一，缺少发生革命的条件，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要的群体感到了严重的剥夺。农民被强制征地、民营企业被歧视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等，这些不满的范围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一级和二级危机。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不满普遍存在，四级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是可能的。

这就是社会上主要行动者的基本状况，玛雅金字塔，我谈完了三级。

最后一层，金字塔的最底层，就是影响行动者的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发展状况。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政府的预计是经济增速将由 8% 降到 7 至 8%，韦森教授认为没有那么乐观，5% 到 6% 已经很好了。但是一般还是认为，现在 9% 或 10% 的均衡状态肯定被打破。新的点在哪里呢？究竟 7%，还是 6%，还是 5%，说不清楚。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真实的影响是什么，都是未知数。但我们知道，经济下行，如果影响就业，那就会对第二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这个社会动荡的基础。另外，经济下行对财政的影响更大，这是不确定的因素。经济状况如何，对未来社会上的主要行动者，他们往哪个方向走，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就是财政状况，这对于危机有重大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增速如果 10% 上下，以前的惯例是财政收入的增速通常在 20% 到 30% 之间；反过来，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的增速，会下降多少，是不是同比下降，或者不止一个台阶地下降，还不能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是如果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出现财政危机，就有可能出现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政府压缩开支，一个是压缩民间的，一个是压缩政府的。如果压缩民间的，我们知道，养老金的缺口已经存在了，如果再压社保、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政府对工农失约，本来农民工工人满意，很大的基础就是因为福利好，在这个契约关系上他们赚了；如果政府失约，为了保护既得的福利，三四级危机发生的概率一定大大提高。哪里点个火，可能就闹起来。如果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是非常昂贵的政府，一般政府自身的消耗（有一个词叫官耗，即官维持自身的消耗），日本、台湾都是 6% ~ 7% 的样子。美国最高，相当于财政收入 9% 点几，他维持自身的运作，还管全世界的事，也不过就是财政收入 9% 点几。中国政府是多少？有好多种说法，比如 23%、24%，25%，26%，这些数字都有。

讲到腐败，我可以提供一个数字，就是中等腐败的国家，腐败金额通常占 GDP 的 3%。那就是说，如果 GDP 是 50 万亿，每年的腐败金额就是 1.5 万亿左右，差不多又是财政收入的 10% 了。这样在原来 25% 的基础上，一下子蹦到 30% 多了。加上腐败金额，官耗就是极其巨大的一个数字。我们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比台湾、日本那些东亚的政府要昂贵 4 到 5 倍，比美国政府要昂贵 3 倍。如果压缩这个，那就是反腐力度还要大大加大。那会引起什么事？而且全面

性的压缩，官场内部会不会动荡起来？如果要真的稳定地往那里走，加强预算，像韦森他们正在推动的这些事情，实际都是大规模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

财政如果出现问题，第一是压缩开支，第二就是增加税收。刚才讲了，官耗已经非常巨大了，即使不算贪污腐败这类的隐性负担，目前中国的税费负担已经不轻。进一步增加中小企业的负担，将增加破产，逼走资本，提高失业率。向民众增税，也可能引爆危机。现在经济增速下降，象韦森他们提的建议，最重要的建议就是降税，政府就是不降，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去投资，反正就是不想降税。所以要降税，也是不容易的。财政出了危机，第三个办法就是印票子，搞通货膨胀，但是高通胀是对全民的剥夺。我们知道，1989年出了大问题，出现二级危机的一个基础性社会背景，就是连续几年两位数的通胀。如果财政出现危机，还会削弱政府解决环保问题的能力，而以前的四级危机，大多数是起源于环境问题。总而言之，经济下行，还有财政危机，将把工人农民甚至于全社会，推入严重不满的阵营，三级甚至二级的动荡出现的概率都会大幅度提高。财政危机还能使维稳成本高得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这会严重削弱控制危机的能力。这是影响社会上的这些行动者，危机制造者或危机平息者的第二大因素。

第三个因素，就是官家权力的扩张。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个说法，就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的腐败。官家的权力，或明或暗的扩张，不管是以腐败的形式，还是以垄断的形式，都对其他社会集团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可以激怒各个社会集团。因为腐败和垄断的实质，都是剥夺。刚才说到，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占到GDP的3%，这个数字相对30%的

税费负担，好象并不高，并没有不可承受，但到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到了财政危机发生的时候，这个数字就变得难以容忍。还有就是垄断除了抢钱之外，它的实质是对自由的剥夺，剥夺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这方面的高掠夺率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抢钱要大的多。同样的资源在垄断领域和自由竞争领域，效率大幅度降低，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除了抢钱导致的效率损失。而且既是当前的损失——扼杀自由竞争带来的发展活力，更是难以估量的长远损失。还有就是扩张，包括强征土地，都会使原来就已经在房价之中深感被剥夺的农民工和全社会要买房的人，都加剧不满。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蛋糕越来越大，权力多切走一些还可以忍受；经济发展一旦减速，即使抢钱比例不变，引发危机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如果管住了，通过反腐这些手段，管住了权力的扩张，政改的必要性就降低了一半，损害经济而非损害尊严的那一块，通过反腐就解决了。如果管不住这种扩张，经济减速，财政危机就可能加重。按照一般的历史经验，治标不治本，这种管制通常都是短期有效，长期很难知道。这是第三个影响因素，就是权力是否不受制约、继续扩张。

第四个因素，就是观念的变化。我们知道，现在的观念究竟是什么，不太容易表达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24 个字里面，平等、民主、自由、法制，都在其中，跟所谓普世价值的说法差不多。但是官方的一些说法又和普世价值相冲突。所以现在官方的主流观念很难清晰表达。如果官方的意识形态拥抱民主法制，官方的意识形态向民主法制靠拢，民间的启蒙、公民的权力意识就会加速。如果官方的意识形态坚决反对这一套，民间的第二文化将日益繁荣，逐步形成社会的主流观念，架空官方的意识形态。官方无论怎么做，

这个观念恐怕都是一个会带来动荡，引发而非平息危机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随着经济增长、民间经济利益方面的满足，会加强对权利、尊严、自由这些层次的追求的强度。按照马斯洛学说，人民吃饱了，后面的追求就变得比较重要，安全感、归宿感、尊严感，一直到自我实现，对自由的要求会得到越来越高的估价。这时候整个社会对于经济增长的评价相对下降，对于公民权力评价的重要性就会相对上升。这跟观念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社会发展自然带来的结果。

第五个因素，就是组织成本的下降。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组织联络成本大幅度下降，于是在原来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NGO 和媒体之外，又形成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包括自媒体、微信群、粉丝群。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有组织的行动者，而且这些组织之间还有密切的联系，一呼百应。这些组织成本的下降，就能够使危机爆发一下子蔓延全国，速度非常快。这是第四层，影响社会行动者的因素。

第六个因素，政府手里的王牌。一旦财政各方面出现了问题，政府手里有什么牌呢？政府手里掌握了很多好牌。第一张王牌，就是向民营企业开放新的领域，比如说，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建设。开放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利益，必将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如果财政危机严重，打这张牌不够，还有第二张牌。政府手里有巨额的外汇储备，现在有 4 万亿美元。这 4 万亿美金进来之后，政府已经把人民币发出去了，公司的钱到了帐上，它取钱的时候不能取美元，印票子给他了。于是这 4 万亿美元，就相当于铸币税，这是政府可以控制的一笔巨款。4 万亿美元，即使两年财政颗粒无收，政府也能支撑

了。单凭这张王牌，即使出现财政困难，支撑四五年也问题不大。政府手里还有一张价值同样巨大的牌，就是出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价值多少，我听茅于軾老师估计是 40 万亿，有人说 60 万亿，最高数字有说将近百万亿，反正是巨大的数字。这么大笔的国有资产，拿出去填财政窟窿，补社保；又改善了国有企业，把它从官企变成了真正的民企，同时还能够缓解危机，一举两得。这张牌打出来，好象五六年、七八年的财政困难，都不在话下。这几张牌支撑起来，中国保持十年以上的稳定，在财力上应该没什么困难。何况还有一张大牌，实在不行了，就印票子，印票子太多了，通货膨胀不行了，就搞土地私有化，把一个巨大的市场引入中国经济，又能吸纳巨额的货币。这几张牌连续打出来，好像 15 年左右，政府在财政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如果政府不把内部引爆，未来的 10 年到 15 年，有相当乐观的前景，但如果提前引爆，那就很难说是什么状态了。

最后我根据这些因素，根据以上玛雅金字塔式的结构，做几点对未来的综合性推测：

第一，未来五到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 7% 左右，那么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如果出现，按照惯例，政府将及时让步，主导并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未来五到十年，在中小级别的危机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或者中型的改良。这些改良发生最大的可能，是在比较容易控制的领域，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独立等。

第三，未来五到十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以完善的概率比较高。虽然垄断集团

不愿意改革，但是一旦船要沉了，总得有几个胖子被踹下水去，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那时候船上很快就会形成共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去年我写这个的3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动作。国务院系统小步快走，几乎一星期一个，不断密集地推出自由化倾向的改革，好像就是积小胜为大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动作很明显。

第四，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果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妥当，各种危机应对顺利，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一的梦想成真。但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速总要降下来，要降到正常的增速，财政的好日子总要去，那时候，政府手里的好牌不多了，国有资产基本划分完毕，权力的油水越来越少了，麻烦越来越多了，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保福利，富人抗税费。也就是说，一级二级三级危机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那时候，官僚集团将追逐最后剩余的利益，就是官僚集团将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尽量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完全转型。

这就是我对预测政治体制改革危机如何驱动的这么一个四级预测框架，金字塔框架的一个基本的介绍，说完了，谢谢大家。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非常感谢吴思先生给我们做的一个别开生面的演讲。他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做了分析，把政治、经济各方面结合在一起，有一部分让你感觉是对当代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提问，或者评论。

杨燕青：非常感谢吴老师特别精采的演讲，我是第一次

听吴老师讲。我们搞经济的人听了这个，确实感觉别开生面。你讲到如果未来财政面临困难，政府有哪些牌可以打。你刚才把中国政府能够打的牌都讲了，我再补充一点，还可以扩大债务。目前中国企业负债占的比例最高，大约占GDP的160%，这是巨大的负债。但如果看政府的负债水平，按照中国官方估计，把地方债和中央债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到GDP的40%，按照国外的估计，认为60%是安全线，但很多国家都到了70%或80%。所以我们通过发债来弥补财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未来这一块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我想问的问题是，你这个框架分析得特别好，能不能用类似的框架来分析一下，这届政府最关注的事是什么？

吴思：我只能说，我原来弄这个框架的时候，没有想到三中全会有这么大的主动改革的力度。但是我觉得，这个改革力度虽然大，但主体还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预测之中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经济下行带来的危机太大了，有可能引爆很严重的一系列反应，所以主动先动手，现在就动手，就改起来。所以我对三中全会的决定，感觉有点出乎预料的强，但是没有出这个大的预测圈，这毕竟不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面，就是法制。法制具体怎么改，现在还没有推出来，要等四中全会出来，到11月份我们才能看到。但是我觉得，三中全会决定所推出所承诺的法制方面的改革，也是承诺之重超出预想，甚至我觉得都不可期。不可信是因为他强调的是司法的独立，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个承诺重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个承诺，要往这个方向走，一定还有空间。

按照惯例，在全世界关于法制水平的评分上，最高1

分，最低 7 分，中国现在的法制水平就是 6 分或者 7 分，属于倒数一二的水平。一般欧美比较成熟的国家是 1 分，俄罗斯大概是 4 分，台湾在转型之前的蒋经国时代也是 4 分上下。在威权社会水平下，甚至象俾斯麦那个时代，德国皇帝那个时代，德国都能达到 4 分甚至 3 分的水平。我们的法制改革有空间，但那个空间大概就能到 4 分左右的水平，比现在大进一步。这是我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在司法领域改革未来的预测。

我看到当前的改革逻辑，是狠狠地压“官”当中的贪官污吏，然后狠狠地掐住“士”之中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麻烦制造者。官中的贪官污吏也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使这个社会动荡不稳定，干他们充满了正义感，而且这对社会有好处，能消解民怨。然后，把挤出来的权力挪给企业家，挪给民企，不断地搞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家的自由空间，把经济上带来的好处分给工农。于是，士农工商中的农工商都在改革当中获益。受损最厉害的就是贪官污吏和士。这个士现在的日子，哭爹喊娘，而且我估计还会持续下去，因为看不到有效的反抗，没有让他们觉得得不偿失，就这么收拾了，社会稳定了，你能怎么着？他们又不能怎么着，那就会继续走，直到走不动，弄的得不偿失为止。这么做，如果反腐反得太过分了，有内部的风险；但是控制好了军队，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很难估计，这个事在人为。我看了孙立平的一个说法，他有一个感慨：原来贪官污吏也是一帮怂人，把他们打成这个样子了，他们也就是认帐了，也没有看出什么有效的反抗。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一马平川，还能往前走很久，就变成一个威权式的改革。强人压住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压住麻烦制造者，同时强化一些法制，

维持经济的稳定，让工农商都支持。这样一来，7年之后的2020年，三中全会决定的到期之日，中国经济翻了一番，法制水平比现在前进一两步，社会的非政治方面、慈善方面、环境方面都略有进展。到那时候，中国社会大体处在比较接近台湾转型前的威权社会的60%或70%的水平，还到不了那个水平。到了那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的转型是非常顺的。我们看到威权社会的转型，台湾的转型，因为它比较多元化，有法制基础，有市场经济的基础，转型就很顺畅。可是后集权社会，比威权还要厉害还集中的社会，像苏联，转型就非常困难。他即使转过去，转成了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也会大幅度地后退去补这个课，所以现在俄罗斯经常被国际学界断定为威权社会。集权向威权转，威权再向民主法制转，这是比较顺畅的逻辑。如果改革一切顺利的话，到了2020年，我们就是威权社会的低等水平。

乔依德：谢谢。谁还有问题？

谢荣兴：我简单讲一点，4万亿美元拿不回来，这些钱在美国是拿不回来的。拿一部分都很困难，实现不了。

乔依德：你说拿不回来，什么意思？

谢荣兴：美国国债，不可能抛掉的。

杨燕青：我替这位老师补充一下。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这一块是负债，就是企业和个人随时可以来换汇的，央行也这样讲，但这也不完全对，但有一大半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要用的话，要用财政部发债把它买回来。所以如果是发债买回来你才可以用的话，到时候就变成了政府的债务。

韦森：我再补充一下。实际上，这个债已经还掉了。因为从2008年易纲采取发央票的方法，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已经33万亿了，已经把票子发下去了。之后，央行围绕控

制通货膨胀，这几年央行不断提准备金，把这个压在了央行里面了。

杨燕青：你讲的是两个概念。那个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外汇占款的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发人民币的过程，否则不能换汇，是一个结汇的过程。但是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你必须得用一定的资产，把负债换回来，你可以用财政部的国债或者发一个什么债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凭空把这块拿掉，你拿掉之后，那边用什么来补呢？

韦森：根本不用还钱的。

张伟：中国的货币制度最基本的一点：我们发人民币是没有担保的，其实是这个问题。

任新建：吴老师，我觉得今天非常受教，讲得非常好，水平非常高。我有两个观点，想探讨一下。刚才你讲的时候，第一个呢，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就是人口红利的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口，实际上不管现在有没有进入拐点，以后总归是向下走的一个态势。这个态势就决定了前面很多分析的因素。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可能压力会变小，会越来越小，因为我们每年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就业，政府最大的民生就是就业，所以这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我们的 GDP 增速，可能可以放得更宽一点。刚才吴老师你也分析，我们财政有很多支持因素，足以保证我们财政 10 到 15 年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吴老师有一点没讲到，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国际的因素。比如站在上海来看，开放对我们发展和改革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开放也带来观念的影响，我们如果没有打开国门，可能看不到外面很多精彩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因素也对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一个影响？如

果形成影响，它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它会成为第一，影响后面所有的其他因素。比如我们观念的变化，对民企，还有对国企的影响。请吴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

吴思：谢谢，你说的都对。经济增速情况最重点的就是失业问题，跟人口红利也有关系。我同意应该写进去，但我是外行，所以没把它说进去。再追究一下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我们的大学，一年大概有 400 万左右工科毕业生，挣钱也不多。我们有世界上最廉价、最大规模的工程师，好象欧盟、日本加起来不过 40-50 万，我们是他们的 10 倍。中国用这么便宜的工程师，可能未来多少年之内，要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一次升级。原来我们是靠劳动力的便宜来竞争的，未来可能靠工程师的便宜竞争，能够顶得上欧盟、日本、美国的中下层，这是未来又一个乐观的因素。要是把这个因素加上去，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好一点。

你刚才说的，我忽视了两个，一个是我没有谈国际关系，因为我不懂，还有我没有谈民族关系。实际上，民族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看到新疆、西藏，甚至于台湾和香港在闹的事，都可能对我们形成巨大的冲击，值得认真考虑。可是我觉得那些问题，不管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和台湾的关系，还是民族关系，核心还是公民关系。我们在这里作为一个公民，如果都对政府不满，再增加一个民族因素或宗教因素，还有一国两制的因素，这种不满会更加强化，变得更有分裂型，更有对抗性。问题是我很难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避而不谈。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能够比较容易造成三级危机的领域。本来也就是四级危机的水平，加上民族因素，就是三级。过去的几次三级因素，都发生在民族地区，借助民族之力，民族情绪之力，或者宗教这个劲，

一下就够了，就能完成一次升级。

国际问题也是，我觉得中国和国际的最大关系，就是我们通过一百多年和外国打交道，发现中国的制度跟外国的制度比起来，落后了。他们的民主、法制这些东西——稳定，而且有很强的激励因素——安全。我们这边呢，隔一段时间就要折腾一下，我们历代王朝的平均寿命，大一统是 171 年，如果加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平均寿命只有 67 年，到时候就死。40% 的死因是官变，内部反了；40% 的死因是民变，老百姓反了；还有 20% 的死因是外敌入侵。这些问题过去没有解决，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到时候这个制度就死了。于是，我们就看到那里有一个更好的制度，这里有一个有缺陷的制度，把这个制度改到那边去，我们就安全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史的环境当中，看到那里有大利，这里有要避的害。趋利避害就形成一个世界史的潮流，你要挡这个历史潮流，世界史潮流，就是挡人家财路，就是断人家财路，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中外关系背景。

乔依德：时间也不早了，吴思老师还要赶回北京，明天上午他还有活动。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他的精采演讲表示感谢。另外我也很感谢韦森老师，他给我们引荐了吴思先生。趁这个机会，我也向大家呼吁一下，以后你们发现有什么题目，或者有什么好的演讲者，请跟我们推荐，也跟我们社联沈书记推荐，使我们这个沙龙能够越办越好。再次感谢大家，在炎热夏天冒着酷暑参加我们沙龙，今天的沙龙就到此结束。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安排”研讨会

2014 年 7 月 28 日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开会之前，我也拟了一些题目给大家，大家可能也做了一些准备。我刚刚参加了国际会议，有一点吃惊，这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这个事，虽然会议的内容几个月以前就决定了，但是有几个人做 PPT 的时候还是把这个内容放进去了，说明国际上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

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开一个圆桌会议呢？我看了国内的讨论，我觉得有二件事还是有讨论余地的，原因有二个：第一，是国内的报道把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二件事情混在了一起，没有分得很清楚，当然这二件事对国际货币改革和金融治理都很有意义，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不能混在一起。第二，现在的报道中，对金砖国家关注比较多，对 CRA（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 应急储备安排）关注比较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CRA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甚至会高于金砖银行。我们今天可以对这些问题谈得深一点：这二件事总的来说，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会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对我们人民币国际化又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先从这些角度谈一下，然后再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卓越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先谈一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宣布了以后，报纸、电视都来采访过了，我为文汇报也写了一篇

短篇，为我们的一些基础的报道进行了一些分析。最近我连续接待了美国的一些高层人士，参加中美经济对话的那些人，今天早上接待了美中贸易委员会的副主席。他们不约而同都谈到了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库的一些事，他们有很多的疑问，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金砖银行的确是一个突破。

在没有发达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没有主导权的背景下，新兴国家自己搞了这么一个开发机构，应该说是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一个新模式。原来发展中国家开开会相互支持，中国和非洲有论坛，中国和拉美国家也有很多合作的机制，通常都是在双边的基础之上。如今在多边的机制上，建立了一个大家认为不大可能的银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历史的突破。

有人提到金砖银行将改变国际资本市场的话语权，我估计这个目前还为时过早，因为即便金砖银行将来运转自如，也很难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改变原有的话语权。为什么？第一，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包括经营体制，不是一二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市场上逐步有一定参与能力或是建一二个这样的机构就可以突破的，对于现有的发达国家占据领导地位的这么一种格局，你可以说是打破垄断，但是争夺话语权是有很大问题的。欧美已经很关注这个问题了，我和美国的学者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是这个银行包括应急储备库只是提供一个额外的资金渠道，他们欢迎。但是，他们接下来也说得很清楚，如果金砖银行的贷款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是从政治需要来发放贷款，那就提出了问题。第一，这是对我们现有的资本市场的规则提出挑战；第二，从政治的角度发放贷款，是不是可以维持下去，项目投资了以后能不能收回，最后谁来背这个包裹？这就是意味着打破

话语权不是这么容易的。即便是重新建立一套规则，评估项目，评估贷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要打破原来的规则，可能还为时过早。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什麼？我们官方的话语基本上还是强调，我们建立这么一个银行还是从互补的角度，强调我们现在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但是来自世界银行以及现有的区域银行提供的资金不够。我们并不准备完全搞自己的一套规则，包括应急储备库。应急储备库和清迈协议下的共同储备库都有一条规则，一旦贷款超过了 20%，它要按照 IMF 的规则。为什么？就是成员国认识到，如果不按照 IMF 的规则，没有任何的条件，存在将来这个钱是不是能够收回的问题。钱能否收回，是这么一个应急储备库将来可否长期运行的一个重要基础。

毫无疑问，金砖开发银行主要的目标是对基础设施提供贷款，或者是提供项目的资金援助。印度和南非这二个国家是最支持的，所以最早是印度提出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分散一部分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虽然投资期限长，回报率相对于资本市场比较低，但我们还是分散储备、减少风险。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战略与推动国际化的战略是吻合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我们将来出资金，提供贷款，也有利于我们的基础设施企业走出去。

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设想，未来金砖银行也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好，现在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这个疑问：将来你提供了这么一个贷款，是不是由贷款提供方的公司从事这个项目的建设？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的项目是向全球招标的。如果项目的承包投标不是公开透明的，

发达国家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从未来国际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银行的贷款以及项目建设的程序也不能是封闭的，这对你自己会有利。像我们现在双边的资金支持，经常是我们资金支持了，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用我们国内的承包商。在一个公开竞争的环境下你去竞争，对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让全球接受，都是有重要好处的。

现在发达国家担心的主要是在这一块，就是怕你金砖银行也好，储备库也好，建起来以后完全是按照你们自行的一套来搞，不按照现有的规则和程序来做。

当然我们现在是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增强自己的话语权，这个是对的。但一些基础的国际惯例，对项目的管理，基本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的规律和规则是在那里的，不是打破原有的市场规律。我们国家的开发银行，很多的项目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基本上都按照国际惯例和原则来执行。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在未来在银行的建设中，包括应急储备库提供资金的基本原则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既要打破发达国家垄断的格局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又不是完全抛开现有的国际规范另搞一套。这样，金砖银行也好，南南合作也好，空间会更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现在也提出来了，金砖银行各方的股份是相同的。美国的学者就说，现在美国占主导地位，总有一个比较强的一方说了算。金砖银行按照五家各 20% 的股份，将来到底谁说了算？如果是中国说了算的话，那就是意味着中国将来会出更多的资金，包括债券的发行。但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让中国占更多的股份，就说明其他国家不愿意让中国主导，这个矛盾没有解决，在未来实践过程中，万一大家意见不一致，权利分散，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因此，

这个问题也不能小看了。我个人觉得，起初为了减少各自的矛盾，构成这样的一个平均股份，但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范，可能需要比较早的来决定。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在一起，是因为合作的动力大于现存的分歧，因此还可以不断往前推。另外，我觉得中国在金砖银行也好，包括在储备库（储备库中国出资是最多的 410 亿），不需要什么都是中国说了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最大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在于你的影响力，在于你让别人信服你，愿意听你的话，而不是处处从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一旦成为国际的一个多边机制，有一点国际产品的味道，中国要做好思想准备，在短期内要做贡献，不要贡献还没有做，马上就要有中国独特的一种话语权，其他的国家就不能接受，未来的合作就会有摩擦有矛盾。

比如说，中国最早时提出我们出 50%，其他四个国家各出 12.5%，我们出行长，地址的总部也放在中国，等于完全是中国来主导的这么一种局面，大家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现在虽然在金砖国家中实力最强，发展前景最好，也真正成为世界的大国，但是你要让别人承认你，你必须要有魅力。这个魅力，是在实际的运行中，让别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大家相信你。为什么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一下子把欧洲吸引到了自己身边来了，因为他对欧洲做出了贡献。我们中国也要搞马歇尔计划，就要把中国看成是为发展中国家做出了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共产品，把这个放在最前面。而不是马上觉得我现在是第二大国家，马上就要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处处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如果你是处处有自己的话语权，别人会觉得你太强势了，大家对你的疑虑会增加。我觉得在金砖银行的管理中，中国即

便是要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也需要用软实力，需要和其他国家通过协商达成一致，逐渐地发挥影响。

当然很多媒体都提到了金砖银行以及应急储备库的安排和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个相互的促进作用。从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角度来说，一旦这些国家在国际收支发生逆差，需要动用资金的话，储备库的安排使得他们可以动用一部分人民币资金，这样人民币走向国际的前景就会更好，起码对人民币走向国际有一种象征性的影响。现在的话，实际意义还是不大的，就好像清迈协议一样。各方在共同储备库里只不过是出了一部分的份额，这个资金仍然是自己管理的。未来储备库里，对某一个国家要援助多少钱，是按照原来储备库里各自的份额来提供资金的。如果是把钱放在一起建立一个基金，那合作的意向会更强。

现在我们建立的金砖银行和储备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是积极的，但还不是立即的，仍然是以美元作为资本金的。将来金砖银行凑足了 500 亿，还有 500 亿肯定是通过发债，发人民币债或美元债，将来会更加利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作用也是有的。但是这二者之间的作用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二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现在经过了激烈的竞争，最后从各种角度考虑，总部放在了上海，对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推动。因为金砖银行是全球聚焦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概念以及未来发展前景有了进一步的期待，这对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有一个积极的促动的作用，而且上海与孟买、约翰内斯堡这些城市相比，各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国际化大都市的形态都是优于他们的，最后落在上海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中央政府

觉得放在上海对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所以金砖银行选址上海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上海接下来可能需要对金砖银行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比较全面的配合。将来在金砖银行工作的人，可能你要给他外交的或者是国际待遇，就好像是世界银行在美国纽约的运行一样，人员进出要自由，要把它真正当成是国际化的机构。这一点我们应该学一下纽约，包括瑞士，这种国际机构集中的城市，如何对待国际机构的总部，为他们提供什么的条件。不要一开始就按照我们国内的一套模式来套，套得不好，别人有一点不好反映的话，对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上海以及未来上海吸引其他国际机构落户，都有不利的影响。应该以开放的眼光和态度看待金砖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包括将来金砖银行所有包括资金进出的各种经济活动，都应该给予特殊的自由化的一种模式，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还强调我们的账户不开放，金砖银行到我们这里来了以后还有很多限制，这就会有问题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应该很好地考虑这一点。

另外，金砖银行会需要很多的人才，这可能要在全世界招聘，按照一定比例选拔一些人过来。在运行过程中，也会有良莠不齐的素质，上海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吸引这些人。金砖银行是一个多边的投资银行，或者是开发银行，主要是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但是这些项目的资金提供，一定要有后续的资本市场的私人部门的资金跟进这些项目，才能使这些项目很好运转。比如说一个国家建一座桥，不可能什么项目都是 100% 让一个国际开发机构来承担。原来世界银行有一些项目，都是国际开发机构先行一步，再带

动私人部门的投资进入。这一块，我们上海的银行，包括一些商业银行，包括其他一些金融机构，都应该很好地关注金砖银行总部在上海，在未来的项目运行中给我们提供的投资机会以及人民币走出去的机会。我希望将来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鼓励中国的金融机构跟随着金砖银行的项目，积极走出去，为这些项目提供辅助资金。

金砖银行就像世界银行一样，启动资金提供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资金要通过市场的途径来筹措。这一块，我们上海如果不积极主动参与，让新加坡、香港的金融机构参与的话，就会丧失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上海的金融机构，应该做一些事先的工作，然后做好准备，配合金砖银行开拓全球业务，那时候人民币走出去的重任，更多的是在于国内金融机构配合金砖银行到海外进行项目投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未来发展前景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应急储备库做实，包括原来清迈协议下的共同储备库，把钱拿出来，放到一个专门的机构里，变成一个基金，这个基金交给金砖银行去管理。一方面金砖银行有了更多的资金，一方面应急储备库的提取和使用就会比现在更加灵活方便。我举一个例子，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产生了一波冲击波，冲击了当时的韩国，韩元的汇率急剧下跌。韩国就要求中国提供资金，中国没有立即提供资金，最后人家到了美国，100亿的互换马上就签署了，互换协议一签署，国际市场得到了信息，马上就稳定下来了。当时还不叫共同储备库，清迈互换协议不能落实，未来我们的金砖银行的应急储备库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尤其是南非、印度、巴西，都有可能发生国际逆差，需

要 IMF 资金之外的应急储备库的资金。如果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很多内部条款没有进一步落实，而且不能真正按照我们原来设想的样子落实的话，到使用的时候就会发生困难，然后给外部非常不好的评价，其前景就会打折扣。人们对金砖国家的合作能力就会产生疑问，一旦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还不如不搞。

我觉得这些都需要去落实，因为中国是所有这些主意的一个积极推动者。因此中国有必要领导这些国家，超前地把很多具体的制度和规章夯实，实实在在地推动。第一阶段已经过了，象征性地打破发达国家垄断的这么一种创记录的政治意义已经过了。现在就是要让它运转，使其政治意义可以得到持续，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政府的财政部和开发银行进一步地研究和落实。很多问题他们还没有考虑得非常周全，因为我知道当时谈判总部在什么地方、资本如何确定等等也是非常不愉快的。外部有评论，对金砖银行印度有很多人是表示不开心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就先说这么多。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 刚刚徐老师比较全面地把金砖银行和 CRA（应急储备安排）都说了。当中有一些特别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中国参与这个事，不要一开始就是我要做老大，我要有话语权，或者对中国有实际的好处。这是一个国际公共平台，中国要对世界做更多的贡献，如果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愿意拿出一些东西来，别人说不定还是觉得你很好，这样子慢慢的自然而然的，中国的一些想法就能够贯彻下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接着你刚才说的的问题，还想问一

下，你说到了清迈协议，最近我看报纸上说最近我们的资金又加倍了，到 2400 亿了？

徐明棋：现在是变成了 2400 亿了。

乔依德：这当中有一个挂钩的问题。这次我在秘鲁开会，有一个 IMF 的人跟我说，几个月以前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很担心，认为我们在和他们唱对台戏，结果是 30% 以下额度的紧急贷款可以不与 IMF 贷款联系（本来是 20%），他说这样子我们也比较放心。不过问题就来了，既然你什么都是要和 IMF 联系，为什么要搞这个呢？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猜想，因为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做事比较稳，怕没有把握，从长远来说的话恐怕不会老是和 IMF 挂钩，挂钩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清迈协议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挂钩了。我想听一下，徐老师你的观点是怎么样子的？

徐明棋：第一，中国对这个问题，在真正操作的时候，是很讲究我们国家的安全的，不会不按照现在基本的原则和规则，就随便把钱拿出去了，除非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出去，从政治角度给的无息贷款。参照现有的 IMF 的贷款规定，保证资金将来可以得到偿还，从我们有关部门的角度来说也是赞成的。另外，成员国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子要求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参照部分 IMF 的规则和条件发放贷款，实际上是为了可持续性，为了贷款安全。如果是贷款发下去以后，收不回来怎么办，这是任何国际金融机构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如果完全不按照 IMF 规则，自己另外创一套，如何建立规则和识别风险都是问题。所以开始是 20%，现在增加到了 30%，与 IMF 有区别。因为 IMF 资金贷款的审核是比较长的，在某些成员急需资金的时候，一下子资金到不了

位。我们区域合作可以先提供资金，让你渡过难关。如果资金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国内的政策应该进行怎样的配套以保证国际机构提供的资金得到偿还，在这样的背景下，参照IMF 或和 IMF 的规则有联系，就显得有必要了。IMF 本身的规则也是在改变的，危机之后也改变得更加合理了，原来贷款给你，你必须在财政和货币上都要紧缩；现在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让你的财政保持宽松，不要马上紧缩，不然经济危机会变得更加严峻，现在也考虑到这些条件了。

因此我觉得与 IMF 规则挂钩，不是一件坏事。至于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原来完全用政治的眼光或者是担心他们的垄断地位被打破这么一种角度来看待金砖国家，包括我们的 4+3，原来的清迈协议等等，说明他们本身是抱着狭隘的眼光。我们已经说了，包括金砖银行，包括清迈，包括未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不是要取代，而是一个辅助性的或者是互补的角色。因为资金的需求特别大，从现有资金中不一定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是互补的，那肯定就有一些职能会重复，但也有自己的特点，金砖银行已经明确只是对发展中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主要是面向亚洲，有比较明确的服务范围，对现有的机构不构成挑战。

但是我听到了一个很公允的判断。美联储的一个主任说，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发展银行的改革速度太慢，这些新兴的国家已经不耐烦了，必须要听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包括让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原来很少有人会考虑这么一个诉求，现在金砖银行对他们原来的垄断的地位已经提出了挑战。

刘海影（卓越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国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我今天过来主要是学习的，我更多的是提一些问题。金砖银行的成立肯定是一个大事情，我们现在做的是全球代表性的，有亚洲的，有非洲的，有美洲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金融安排的特点不一样，而且我们这个安排既带有开发银行的性质，又带有货币体系的性质，它的全球代表性会带来一些挑战。由于金砖五国的人口、GDP 和地理的这种规模，内部的异质性还是蛮强的，中国和非洲，俄罗斯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代表不同经济体性质的前提下，要取得无缝运行，对它的挑战是比较大的。IMF 本质是西方的体制在主导，对一些原则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这个新体系，可能认同度和一致性的程度不像 IMF 这么的高。中国的基建和贷款的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基建投资可以带给社会很多的收益，但是无法落实项目投资的收益，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我们的土地国有化，基建所带来的发展可以通过土地让当地银行有一个回报。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推动基建投资的话，带来的挑战就比中国大一点。这样，对这些国家的基建进行贷款性支持的时候，对于金砖银行的运营而言，管理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因为在此之前，各地的开发银行都做过很多尝试，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基建贷款落后于需求，是有这些困难在里面的。这个政治意义要延续下去的话，需要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合理性。技术上需要克服的难点，就是怎样在土地私有的国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能够做好这个项目的识别，做好风险的管控，以保证贷款的归还，我认为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难点。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应急储备安排。清迈协议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没有被动用应急储备安排，学术界也有非常多

的讨论。我们新的应急储备安排能否超越清迈协议的制度，能够在未来发生金融动荡的时候，真正让储备安排被利用上，我觉得在制度设计上面，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对 IMF 贷款的垢病非常的多，IMF 之所以把它的贷款和一些条件挂钩，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是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在里面。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的流动性问题和支付性问题是无法事先区分的。如果是流动性问题，有一个流动性的提供者的话，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是支付性的问题，可能提供贷款的人就会三思而行。但是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无法截然分开到底是流动性还是支付性问题，尤其是如果没有一些条件相挂钩的话，各国可能就没有动力去进行应该做的痛苦改革。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储备安排有它相当正面的意义，相当于是帮 IMF 打一个前站，但实际上我们的安排承担了更多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个安排，我之前也做过一些研究。我强烈主张，要更多依靠央行的互换来解决这个问题，换言之，这个贷款的金融风险要由各国的央行来承担，而不是由储备资金来承担。由于央行具有对本地货币发款的权利，如果央行来得及选择对自己国内的金融机构贷款并承担这个贷款的风险，可能比由这个机构直接向各国机构贷款更安全一点。

我个人对金砖银行应急安排的整体评价是非常正面的。我也认为，现在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安排，大家都有很多的反思。出现一个平行体系进行竞争，一定有正面的效果，只不过我们做这个事的时候，需要在制度设计的各个方面，进行更加仔细的考量，最重要的是落实经济的合理性。大概是这些意见。

王世豪（原上海银行副行长，城市商业银行清算中心理事长）：金砖银行的意义很大。这五个国家加起来的背景是：他们 GDP 的总量占全球的 20%，国土面积占全球的 30%，人口是占全球的 40%，最近十年占世界经济增量中的 50%。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金融地位尤其受到了置疑，改革的呼声也应运而生，符合了发展中国家的盼望和希望。1991 年苏联瓦解崩溃之后，到现在是 23 年，美国独步天下。这次的乌克兰事件，地缘政治又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一个拐点，地缘政治开始多元化，尤其是这次普京在彼得堡的讲话，美国在很多的地方很弱，不敢动，在和俄国的多次交涉中，它不敢动，说明它的力量是下降了。

在这个当中，其他国家想往上走，想要冒头，也符合地缘政治的这么一个变化。和这个同步的，美国人自己也在变。美国人前几年推出 TTIP，他自己也不要世界大一统的东西，他觉得要分割了，他要选一些好的，可以和他抱团取暖的，世界观一样的，大家都是有钱的，保暖取暖。你们穷兄弟，我们不要的，钱也是我们给的，技术也是我们给的，机器也是我们给的，市场也是我的。你们倒活的很好，最近的 20 多年，我们下来了，不和你们玩了。

所以它自己也是在破坏这种全球化它自己带头破坏，他抱了几个小团。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要保暖，金砖五国首先带头保暖取暖，是最有实力的，这也符合了世界的潮流，这是一个方面。

毕竟基督教的文化，包括英国，在这个世界已经统治了 300 年了。你现在冒头搞起来，确实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低调一点，要有一个补充。它的产生确实是有本身的需要，我们金砖五国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世界银行和 IMF 给钱的

时候有很多的条件，这些条件也有逼迫你改革的这么一个背景，但是改革的方向是朝着一个体系，就是华盛顿共识，朝着这个方向改革，要增加透明度，要增加民主。但这并不是全球多元化的文化可以接受的，你用一种东西，大家不接受，你不动的话，那就不给钱。我们这个成立了以后，就给发展中国家多了一个出路，多了一个选择，至少在现在的背景下是一种补充，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想说一下银行。现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有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要是美国往世界银行派行长，在IMF有一票否决权。亚洲开发银行也是日本人说了算的，中国的资本金要赶上它，按照现在的改革，有人说要30年，所以中国人等不及了。金砖银行和他们是另外一条路，我们是民主的，平等的。但是从操作的层面来看，如果权利相等的话，很难运行。我们中国所有的领导班子，最后是民主集中制，这个是要二面看的，现在是平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了算的话，这个银行很难运作。第二，这个银行的行长是印度人，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因为在这五国当中，印度的银行是最健康的，印度超过了中国。我在银行多年，应该是印度人会比中国人做的更好。因为中国不管是哪一个银行选出来的，实际上都是讲政治的，60多年熏陶出来的，那就是政府说了算，就是党的干部，你要听党的话，你是由组织部任命的。你的专业是属于技术性的，但是最后还是党决定的。印度完全是市场决定，几十年熏陶下来了，也是英国体系熏陶下来的，这种理念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它的治理结构会更讲究市场化，更讲究科学化，中国人一定是偏向政治的，我觉得行长选择印度人是符合逻辑的。

这个建议是2012年的时候印度人提出来的，去年原则

通过，今年正式签署。但是现在操作的话，我认为就好像是基本法一样，这个章程是要花大功夫的。现在有董事会，还搞了一个理事会，二者之间是什么概念呢？中国还搞了一个监事会，主要是为了一个平衡的关系。为了安慰一下南非，还搞了一个非洲分部，这样子是平衡了。但是这里面的行长，经营班子，最后的运作机制怎么样，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

虽然现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美国人说了算，但是一个人说了算有它的好处。这五个国家的法治建设，相对西方国家应该是落后的。在法治落后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现在必须要强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强人政治。如果是这么民主的方式，我不知道将来银行的章程要怎么写，如果是受制于各个政府的影响，如何设计我就知道了，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乔依德：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政治的动力也成立不起来，但是成立了以后，确实是要保持相对的独立。这个事情是很微妙的，你不听政府也不行，毕竟是政府拿钱的，完全听政府，这个事情在市场操作上也会有风险。这个章程绝对是要命的东西。

这次我去开会的时候，有个加拿大人问，听说印度不愿意总部放在上海？他就提出了一个理由，中国对互联网有监管，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像我们现在上网，Google 都上不了，怎么去找材料啊，facebook 都不能上，这个事情别人怎么弄啊，我们国内的一些做法，怎么和国际接轨，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个加拿大人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他上次写了一本书，就强调了这个问题。这些对中国很友好的人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互联网中国

这么监管，那国际组织怎么运行啊？这对我们国内的一些体制也是一个挑战。二年就可以成立这么一个东西，从这种程度来说也不容易，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他也说了，中国是做了让步的，中国本来是老大。但是我是觉得这次基本还是民主化的，但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治理结构，要考虑到效率。

但是另外 CRA 就不一样了，CRA 主要是看股份，中国 410 亿拿了 41% 的股份。CRA 和清迈协议不一样，清迈协议的话，中国和日本的股权是平均的，那就不容易搞得好。在 CRA 的话，我觉得中国应该可以起一些主导作用。中投公司开始投资摩根史丹利，黑石，是亏的很多的。五年投下来，用复利计算，5% 也不到。你既然有胆子投摩根史丹利，那对 CRA 的投资，也应该拿一点魄力出来，你完全的跟着 IMF 走，别人当然是要质疑你了。我的意思是，CRA 到一定的时候，中国发挥主导作用有一些险还是要冒的。我可以理解一开始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适应，但是清迈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经历了，至少 CRA 你是作主了，这里面可以说一点。

郑景昕（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编辑）：那不跟着 IMF，哪一些方面中国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乔依德：因为 CRA 是短期融资。如果是短期的，一点点手头比较紧或者是调头寸，基本面是好的，贷款可以坚决一点，不要这么的死板。现在为什么对 IMF 有意见呢？因为有一个双重标准。以前发展中国家一有问题，就要什么都紧缩，经济不能发展，失业率会增加。现在金融危机，欧美自己碰到了这个问题了，他自己知道痛了。你全部紧缩的话，还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区分，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

如果失业率太高，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会更平衡的看这些指标。所以中国应该是处在比IMF更好的一个地位，因为IMF有很多国家都来决策，我们应该是属于大股东。如果仅仅是一个短期的，基本面还是可以的，应该胆子大一点。不要是像金融危机的时候，谁也不敢用，就美国去弄了。以前美国的财政部长，韩国人把他捧得很高的，美国也没有受损失啊，全球的金融市场也稳定了。这是一个大的判断，通过金融危机，我们应该要学到一些东西。

以前美国财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过一件事的，我是仔细看的，里面有说到了这么一件事：最后的时候，保尔森很害怕，因为摩根史丹利几家都处于危险中。他就想让中国帮忙，打电话给白宫的办公室主任，让小布什打电话胡锦涛，小布什没有表态。结果是直接打电话给了王岐山，王岐山没有表态，他很聪明，知道中国不会出手，马上就打电话给白宫的主任，不要打电话给胡锦涛了，中国不大可能会出手。如果那时候中国出一下手，那是不得了，名利双收了。当然这也是很难的，我也理解，中国有很多制约，如果是投的不好，别人就找你算帐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安排好一定的体制，到危机来的时候，可以适当看得清楚。我们也是一个大国，必须是要经历过这种磨难，才可以成为一个强国。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大国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有本领，把这些事搞定。就好像是美元的互换，也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王世豪：第二，它运作的时候，清算系统现在都是美国人建的。这给我们金砖国家将来建立同样和美国一样的清算系统，奠定了金融的基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尤其是五个国家的贸易量现在占了很大比例，这个是全球化

的。我再也不怕美国人的制裁了，美国最厉害的就是制裁，包括经济制裁、金融制裁，某某人的账户全部冻结，包括对法国的银行罚款 100 亿，他凭的是什么，就是凭的清算。清算就好像是电力、自来水一样的，一断没有办法活的。没有清算系统，开门也没有办法开，所有的国有银行卡住，工农中建全部的停止，汇票怎么办，去外地没有办法结算，客户没有办法来你这里开账户，这就是金融业的最基础的核心，就是清算系统。我认为为中国在世界上联合新兴国家搞一个世界的清算系统奠定基础。将来万一我和美国人，或者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真的和美国人撞的话，我估计要来一次的。要取代它的话，说不定会搞一次的，搞一次的话在经济上它要制裁你，这个是战略上奠定了基础。

此外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大家都是认可的，金砖银行对中国其他的好处有很多，对上海金融中心是一个声誉的影响，将来别的国际机构也会跟来，对自由的进出口会打开一条路。此外，这个总部在上海，运作的项目都是要配套资金的。如果是买一个设施，主要的设施是他放款的，辅助的设施还需要银行的配套，那中国的银行的机会就来了。发债的话，也是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因为总部在上海，所以它附带出来的东西，对提升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有好处的，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未来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地位提高。此外对我们中国对抗美国来说，将来博一下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清算系统他再也无法制约我了。你不可能把我封住了，现在没有办法。现在美国国会叫我们 981 钻台必须立刻撤离，第二天我们就走了，这次中国政府是非常没有面子的。

估计可能是我们有情报，这次真的是会动手。不然的话

话，中国的脸面都没有了，第二天就偷偷的走了，现在的钓鱼岛都不去了。自从胡德平去了以后，现在外交部的谈判恢复，环境部长的谈判都恢复了。因为日本人是两面性的，日本人也有反美的很大的一面，他也想摆脱美国，要借中国摆脱被美国控制。长远看，东北亚，肯定是中日韩联合起来，把美国人赶走，这个是最高的境界。银行的话，可能今后还有副行长的人选，中国应该是有副行长位置的。还有部门老总的人选，这个部门老总的权利也是很大的。在上海的话，虽然人数不会很多，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提高的窗口，也是为中国人国际金融组织里的就业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总是为金融大国储备人才。其他的好处很多了，包括过剩的产能出去，包括贸易。

郭爱军（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处处长）：听了很多专家的好建议，我重新组织一下，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我个人认为打破了西方国家看待问题的一种思路。我把它叫做“卡桑德拉现象”。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人，宙斯给了卡桑德拉预言的能力，但是又不给她让人相信的能力。对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西方还是有一定共识的，但是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又不愿意相信。在对待金砖国家银行的问题上，他们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但这是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大的趋势。

第一，我们现在的增长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整个相对实力的调整方向没有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一开始的时候，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和现在的增长率是有差别的。整体上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国家全球比重的下降，这种总体趋势是没有变化的，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是不愿意相信的。

第二，全球价值在冲突中重构。区域经济的合作加快的这种趋势，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他觉得主导权在他的手上，实际上我们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主导权正逐步有转移的趋势，这一方面他们也是不愿意相信的。

第三，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和各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各自为营的冲突。解决这个矛盾的发起者是金砖国家，原先他们认为解决矛盾的发起者是发达国家，没有想到这次是金砖国家，卡桑德拉的预言他们都看到了，但是未必会相信。

这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解决了几个问题：

第一是解决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发资金错配的问题。这是比较大的。一方面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于开发资金缺口是比较大的，需求非常大；一方面我们的外汇储备以比较低的利率借给了发达国家，这次金砖银行的成立，首先是解决了错配的问题。

第二，解决了国际开发银行体系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限贷问题。多边银行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一定的限贷措施的。我们现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对这种潜在的规则是一种打破和颠覆。

第三，是否决否决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当时提出要在亚洲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被美国人否决了，否决人说所有的援助基金都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次不管是我们的金砖银行，还是储备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对否决权的否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这次是一个重要的推动，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这样一个金砖银行的建立，对于进一步营造国家和平崛起或者是复兴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更好的原则，也提

供了更高的发展背景。

第二，会提供更自由的要素流动，尤其是在金砖国家之间。在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更加自由的要素流动，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的好处。在金砖国家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成立国家级的开发银行，我觉得对于各个金砖国家的发展是有巨大推动力的。

第三，对现在多元文化的强劲互动，会有比较好的推动作用。因为在金砖五国里，从亨廷顿的划分来看，还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文明。所以从这次的发展可以看到，金砖国家之间的互补性是大于它的差异性和竞争性，它的互补性是比较大的。

第四，当前可能有一些金砖国家面临暂时性的经济困难，比如发展速度没有以前高，但这种暂时性的困难不能掩盖金砖国家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种态势。

第五，金砖银行的建立，对于凸显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机制、独立性和合法性，有比较大的一个推动。从上海来说的话，恐怕会有几点：第一是会带来更大的海外市场。第二，会对我们的不管是优势产能还是富裕产能的走出去，带来比较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是人民币的国际化，结合我们正在推进的自贸区建设和金砖银行在上海的落户，对人民币国际化会有比较大的推动。第四，是会形成发展理念的国际认同，也对上海进一步形成国际性大都市会带来比较大的好处。

所以，第一，金砖银行可能会对于金砖国家之间，以及金砖国家大城市之间的经济贸易投资关系，会有比较大的促进的作用。第二，中长期来看，恐怕这个开发银行的功能，不会局限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和开发性融资。第三，我完全

同意刚才王行长所说的。因为现在金砖国家之间就是缺一个独立的清算体系，从未来功能的后续发展来看，我认为形成这么一个金砖国家之间独立的清算系统，对于整个金砖银行的可持续和长远发展，会带来更大的一个作用，我就说这些。

乔依德：我想问一下你，从上海的角度，上海应该做些什么来配合金砖银行总部落户上海，因为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

郭爱军：上海的金融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良性自我循环的轨道。迎接金砖银行落户上海，上海要是做一些准备，主要是人才的方面。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如何形成更好的人才体系，本来就是到 2020 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目标。其次，对我们整个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当前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需要。第三，如果要形成后续功能拓展的话，也需要一定的金融市场体系的配合，我们现在的融资体系和它怎么对接，包括未来走出去，基础设施建设怎么样推进。尤其是发挥资本市场的优势以及整体环境优势这两块，如果做好的话，我们配合金砖银行在上海的落户，对上海整个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及国际化大都市整体的形成，会有比较好的作用。

任新建（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称“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安排应时而生，一方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也将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明显推动作用。

第一，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人民币向投融资货币和储备货币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主导货币之一。金砖银行的成立，意味着人民币有了“走出去”的最便捷平

台，发展中国家预计每年 1.4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第二，将促进人民币资金回流。金砖银行将为海外日益扩大的人民币存量资产提供回流渠道和投资价值。国内企业依托金砖银行开展海外低成本人民币融资也将更加方便。

第三，将推动人民币产品创新。金砖银行本身的人民币投融资需求和避险保值需求，将加快推动人民币产品和工具创新，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人民币海内外衍生产品和投融资工具出现。

短期内，金砖银行将不会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形成大的挑战和改变，但将为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公平、更加便捷、更加便宜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而这些将有相当比例是以人民币计价的，由此将助推人民币加速向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发展。

作为首个新兴国家发起设立的国际金融机构，金砖银行在哪落户，具有明显的风向标意义。这种风向标意义体现在：

第一，谁拿到就意味着谁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金融国际化、货币国际化等方面走在前列，且能够得到其他金砖国家的大力支持，从而基本确立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核心地位；

第二，争取金砖银行落户，将推动所在城市在吸引其他国际组织落户方面走在前列，对于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非常有帮助；

第三，总计达到 1000 亿美元的注册资金，都是真金白银，也是非常有吸引力。

上海胜出的原因有：首先，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世界第二、金砖第一，选择落户中国、落户上海，也就意味着可以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其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卓有成效，基础较好；第三，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推动上海更加与国际接轨、也进一步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

金砖银行也将显著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组织落户上海，将显著提升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水平；

二是上海可以更好借鉴国际金融经验，包括金融理念、金融管理体制、银行运作模式、金融风险管控等；

三是加快人民币产品创新，特别是跨境人民币产品、人民币避险工具、人民币衍生品等；

四是将吸引大批国际金融人才落户；

五是加速海外人民币回流，推动成为人民币的清算结算中心、国际融资中心和对外投资中心。

上海要抓紧对接：一是国际化的软硬件设施，特别是跨境清算结算体系建设要加快；二是抓紧高素质国际化金融人才培养；三是加快金融管理体制、监管制度改革创新，以适应金砖银行发展和管理需要；四是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跨境贷款、人民币国际债券、人民币衍生品创新等方面的风险防范。

上海要做好配合工作，准备工作有这么几项：

一是积极参与具体磋商，关键在章程制定等方面要积极争取更多话语权，服务国家利益，其他还有机构设置、运作机制、治理机制等也要积极参与；二是尽快敲定选址，可能在自贸区，要加快推进相关硬件配套建设；三是着力推进系统建设对接，包括信息基础设施、清算结算体系对接、大额

支付系统，特别是在跨境支付清算方面；四是软件方面，如金融管理制度，资金跨境流动、利率汇率制度、人员培训和国际人才引进、风险管理等，也要抓紧建立并完善；五是抓紧研究对金砖银行的监管模式，金砖银行是国际银行、有限牌照银行，要研究国内的传统管理手段是否合适，是否会推动金融管理体制创新，特别是国内低效的金融管理体制要抓紧改革；六是加快金砖银行业务开发，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如人民币跨境贷款、其他人民币融资、人民币避险工作、人民币离岸交易等；七是加快研究不同金砖国家的文化，适应不同国家文化的差异，便于更好进行前期磋商和未来开展业务。

对金砖银行可能的影响因素：

一是各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可能影响金砖银行独立运作。

二是各国政府间磋商的难度。目前只是敲定了大的意向，具体细节还没商讨，可能成为影响推进的因素。

三是资金到位情况差异。金砖银行启动资金 500 亿美元，五家平均出资，但因金砖国家发展情况不均衡可能会有延迟。未来如何增加到 1000 亿美元尚未明确具体比例、时间节点。

四是文化差异。如果不能站在对方文化角度理解问题，可能导致出现误解，影响金砖银行的顺利按期启动。

五是人才问题。各国金融人才聚集，本地高素质国际化金融人才需求可能达不到要求。

六是监管问题。要解决国际间如何共同监管的问题。国内的监管肯定要做出改革，但又要与我国金融改革保持一致，可能会拖慢进度。

郑景昕：有一句话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特别是做清算，我们和金砖国家的贸易量和发达国家比的话，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做这个的可行性怎么样的？

王世豪：你可以看一下银联的成功，它到现在也就是十年时间，在全球已经覆盖很大了。我不一定要走 VISA，或者是斯玛特，中国人出去的话，就通过银联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中国成为大国，2030 年差不多要取代老大的位置，老大一定是不愿意下来的，非常可能是有一搏。你没有这个东西被他封杀，凭什么他要封杀别人？我为什么牵头搞了一个城市商业银行清算中心，和现在的清算公司不是一样的吗？他们不允许我们开户，我们自己做成功了。我们的清算中心做了六年拿到了央行的牌照，央行是默认的。幸亏我们聘了一个央行绝对信任的老专家，银行很多操作的东西都是他写的，我们运转了六年以后批的牌照，现在全国 100 多家都拿到了，后来农商行也学我们。

乔依德：我们从贸易量来说，和欧美国家比较大，和金砖国家比较少，为什么还要搞 CRA 或者金砖银行？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把握金砖银行的实质是什么。它不是一个零售银行，它是批发银行，是开发银行，是政策银行。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也很直接了当，包括以前很多的采访都把这个搞在一起了。国际贸易的格局会发生变化，这个不会发生变化，因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银行，多少我们也愿意逐步地进去，这个是不矛盾的。为什么搞这个呢，说的难听一点，并不在于我们和金砖国家之间有太大的非常迫切的需要。当然有需要的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不满意也是一个动力，这个并不是

说没有需要，这个也是有需要的。每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一万亿，现在世界银行只能提供六百亿，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做了。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并不是单纯的从商业角度。商业也要做，我们和贸易量最大的地区，银行也要开进去，但这不是很容易的。中国银行在伦敦开了几十年了，以前是做华人，还有企业在那里，他们想扩大，请了当地人做中层干部，不是很容易的。一样的道理，印度开一家商业银行，你会马上把钱存到印度银行吗？并不是说我们搞金砖银行没有需要，也是有需要的。一定要搞清楚金砖银行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开发银行，是一个政策银行，是一个批发银行，而不是商业银行，不是零售银行。

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做出什么战略的调整，这个都是谈不上的，没有到这个程度。我是觉得对这个的意义，一个是要充分的肯定，但是也不要扩大了。实际的一面需要时间的积累，现在报纸上有时候也有一点夸大。

郑景昕：现在俄罗斯受到了制裁，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乔依德：这个对我们就是有好处啊。现在就是让我们银联大量的进去，包括王行长说的，就是一个交换系统。等慢慢有了开发银行以后，我们也建立一个交换的清算系统，可以融合进去，不要的时候可以独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慢慢地做。所以其历史意义要充分肯定，但也要现实，不要夸大。不是说马上就要挑战美国了，也有人说后美元时代已经开始了，这都是过份的东西，过份的东西也是有害的。

我总结一下，怎么把握这个银行的意义。从国际层面来说，这首先象征着金砖国家走向实体化，本来别人是不看好

的。第二，是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你们不做我们自己做了。第三，金砖银行提供了全球金融治理民主化的一个范本。所谓的民主化就是一个妥协，当然这个妥协以后，效益怎么样，是下面的问题了。至少中国也是做了让步的，中国的 GDP 是印度的四倍，这个大家的心里也是明白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第一，是提供了一个国际公共平台，体现了我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第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了一步。但是这个也不夸大了，没有人民币回流的功能。有什么功能呢，贷款出去以后，我们可以跟着很多的配套，这里面的就可以有人民币贷款。资本金不够的时候，要通过发债，这个还是要协调的。有利地位的获得，不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给你创造了一个条件，能让你通过这样的发人民币的债走出去，这是最好的。类似现在的发熊猫债。熊猫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人民币的资产走出去，这有很大的好处，推动人民币走出去。第三，帮助我们外汇的储备用得更好。现在没有办法，我们投了很多美国的债券，有这个就更好了，对我们长期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更好利用外汇储备是有意义的。这是从国家层面来说的。

从上海来说的话，第一，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阶段性差异化的定位。什么意思呢，国际金融中心，一下子要建成类似纽约伦敦很难，先做成有自己特点的差异化的定位。香港的股票市场和国外做得很好，新加坡和银行、债券市场做得很好，我们要和他们不一样。在时间上我们没有优势，我们是在同一个时区。刚好金砖银行来了，吸引这一方面，包括 VC，包括各种投资机构来上海聚集，有利于阶段性差异化的定位。第三，会

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包括咨询、会计、审计、律师都是需要的。你要提供人，一个项目出来了怎么样评估等等，会带动现代服务业，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吸引优秀金融人才的聚集，这对上海有好处。

金砖银行也好，CRA 也好，本身是有一个治理机构，需要我们多做一点研究。我们也会开研讨会，分析一下，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他们有一些什么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吸取。对地区的金融安排做一些研究，看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一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加强对外研究，其次，就是徐明棋老师说的，以开放的心态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另外未雨绸缪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吸引其他金融机构聚集上海，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现在争论外语教育要不要？不但是要，还要加强！有很多的谬论，说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要学中文啊，这些都是胡扯，外语教育要加强。也有人说，你学了外语没有用。你学了化学反应式，有多少人会去做化学工程师？最起码你要认识一些字母吧，至少你去国外旅行，知道这个门在哪里，可以看懂出发、进港和出港。和香港比比看，香港的英语多好啊！对上海来说，也是一种加强。不要听外面说的，只要是中央没有叫你停下来的，一定要做。包括小学几年级学英语，就是没有用对你的脑力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当然我知道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用英语，但是用英语的机会比你用化学方程式的机会大得多，至少是去国外旅行的话，可以看路牌。我们历史上的一些大学问家，都是又懂中文又懂外文的，这一点要加强，我就说这些了，谢谢你们来参会！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